

1996



顺德文史
第十三期

(1987年12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顺德县委员会文史研究组编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人民政协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代表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要加强政协自身的组织建设，逐步使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经常化。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摘自赵紫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目 录

怀念黄佳同志

.....杜启芝 李株园 胡 均 张 晴 (1)

胡庆昌同志生平述略

.....杜启芝 (13)

解放前夕的顺德人民起义军

.....李株园 黎朝华 (17)

顺德华侨中学的诞生和成长

.....李本立 (22)

峥嵘岁月话侨中

.....杜启芝 (24)

江门大良受降接收见闻 (节录)

.....李益三 (26)

忆大良救伤队及顺德赠医社

.....连次生 梁应沅 潘定宇 (33)

重要更正启事

.....本刊编者 (36)

- 黄香林先师事略 区伯憩 冯展辰 (37)
- 康有为《顺德二直歌》 郑 振 郑迪年供稿 (41)
- 何藻翔传 [香港] 陈秉昌 (42)
- 晚清留美幼童中的顺德人 摘自梅嘉原作 (44)
- 先叔岑光樾事略补述 岑君实 (48)
- 乐从忆旧 陈绍文 (51)
- 近代大良手工业的兴替 罗永安 (55)
- 文史杂记六则 罗 列 (62)
- 顺德文物普查漫记 (续) 郭耀昌 (68)

怀念黄佳同志

(一)

怀念“佳叔”

杜启芝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不久，黄佳同志由东江调任中共澳门、中山特派员。1947年3月又调回东江任江北地委副书记。1948年3月再到澳门，任中共珠江地工委（负责中、顺、番、南、三、花等县）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不久转为代理书记、书记。同年5月，珠江地工委召开全区干部会议，顺德由黄静生同志出席汇报，地工委对顺德各方面工作予以表扬和支持。这年秋天，黄佳来中山、顺德等地调查研究，并同黄静生到容奇乌泥塘。当时，黄静生对我介绍说：这是“上级同志佳叔”（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是地工委书记）。晚上，我汇报了容桂地区情况并提出我对当前工作的意见，都得到佳叔的赞同。以后他曾来过乌泥塘几次。最常见的打扮是丝质或薄绒唐装，手上戴上一枚金戒指，提着一把洋伞，脚穿礼绒唐装鞋，这是当时时尚的商人打扮，态度潇洒，面

带笑容。平日交往平易近人，温和幽默。但在开会传达作报告时是很严肃的，分析问题条理分明，逻辑严谨。

1948年底，黄静生调搞武装，离开容桂，当时地工委机关已迁来容奇，我的组织关系就交由黄佳直接领导。1949年初，在地工委的巧妙安排下，由我出面当镇长和自卫大队长，使容奇镇政府和自卫武装落在我地下党手上。这种“白皮红心”的有利条件，使党在容奇的活动有了进一步的保证。当时，黄佳同志交给我的任务是：逐步加强武装对地方的控制，保护地工委机关，发展经济收入，支援各区乡发展武工队，积极做好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他在向我布置工作任务的同时，还细致地问我有什么困难和需要？我提出要求加派干部和武装骨干来充实镇公所和自卫大队，佳叔当即表示同意，并叫我草拟一份开发经济的计划。数日后，我将容奇镇经济发展计划送请他审批。这个计划的要点是：地方征收的各种规费统归镇公所收入，强令制止某些单位霸占规费收入的行为，接办商会的日会，禁止各商号各自发行港元辅币，改由容奇镇建设委员会统一发行。他不但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而且还指示可在容奇搞些商号，既可掩蔽同志，又能增加收入及培养经济人才。不久，地工委调来几位干部，分别安排在我们办的商店和镇自卫大队部，又将中山大坳武工队数人，调入大队直辖的独立第四分队（党领导的常备队）。后来，我又增购了一批三八式步枪及其他武器，加强队伍火力及支援区乡武工队发展。

解放大军横渡长江之际，珠江地工委决定召开地区干部会议，及时部署工作。佳叔与我商量，要找一处能住上十多人而不惹外间注意的安全地点。几经选择，佳叔和谭桂明同志（地工委委员）终于选定乌泥塘我家的一所空屋为会址，

因为此处家具设备齐全，地方宽敞公用，又是独立门户，所处地形也十分有利。佳叔指示，开会期间要认真注意保卫工作，并约好暗号，以便从圩头镇公所带外地同志到会场。还要我每天在下午四时前返回乌泥塘，及时报告情况变化。当时，我还把两支快掣驳壳和一批手榴弹交给会议作必要防卫之用。会后，佳叔便决定地工委机关留在这里，其妻李兰同志也留在这里工作。另外，还租用村里一间民房作地工委机关家属宿舍。5月，佳叔要往别处开会，告诉我如有情况汇报，可找萧志刚同志。后来，我曾到地工委向萧汇报过一、二次。

7月，佳叔召集吕子良、李思明和我开会，传达了东江会议精神，指示由我们三人组成十区工委，由李思明当书记，结束了单线联系的领导方式。

7～8月间，国民党邓铿部队，设司令部于容奇，使我们受到很大威胁。佳叔及时分析形势，指示我们坚持下去，保存地方元气，迎接南下大军解放三角洲。如果情况恶化，可向中山九区与兄弟部队靠拢。并说明地工委主要同志将分别到各地布置迎军支前工作，叫我们区工委密切注意当前复杂情况，作出适当工作安排。广州解放后，邓铿被迫在容桂搞假解放，我们容桂人民武装在地工委指挥下宣布起义，组成粤赣湘边纵队北江大队，挺进中山九区与兄弟部队会师后集中整训。佳叔召我到海洲第二天，叫我同他一起参加中山三、九区大天二交枪投诚会议，会上介绍我代表珠江人民武装司令部，负责收缴中山九区各部的武器。

当时，以黄佳同志为首的珠江人民武装司令部与边纵一团首长何清同志取得联系后，即率领中九武装两个连、中三区一个连及北江大队三个中队回师顺德，渡河后暂驻海尾、

细滘一带。佳叔随即召开容桂各界支援解放委员会会议，分析形势，鼓励大家努力做好迎军支前工作。10月25日，黄佳率队伍突入容桂腹地，占领容桂高地，遍插“八一”红旗，对邓锷部作紧逼包围，并与边纵一团共同迫使邓锷投降，我部队随即进驻坪头，部分队伍挺进大良，接替解放大良的边纵一团之防务。

不久，珠江地工委撤销，珠江地委成立，刘向东同志任书记，黄佳同志任副书记，在乌泥塘召开过一次各县军管接收和人事工作会议后，地委机关于1949年底迁去中山石岐。

黄佳同志除了善于处理对敌斗争，掌握各个斗争阶段的不同策略外，还高瞻远瞩地及时展望解放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建设工作。早在1949年初就着眼培养经济工作干部和物色技术人才。我曾多次听他提到三角洲的蔗糖事业一定要重点发展。1951年，佳叔任地委委员兼财经委副主任时，就规划兴建紫泥糖厂，并亲任工程处主任。那时我在本县也是搞财经委工作，经常到石岐开会，向佳叔汇报工作。

1952年所谓“反地方主义”运动中，黄佳同志虽被诬陷受整，但他仍坚持党性原则，不随波逐流。由于长期艰苦积劳，加上“左”的困扰，1954年黄佳同志在广东省专卖事业局任内因患癌症，不幸病逝，享年仅四十一岁。

黄佳同志虽然已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但他生前那种对党无限忠诚的崇高革命品质，却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

(二)

回 忆 黄 佳 同 志

李 株 园

黄佳同志出生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原籍广东东莞。他早在读中学时，就接受进步思想。后因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迫退学。一九三四年又因参加当地进步爱国青年的秘密活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曾逃亡外地。后来重回东莞，并于一九三六年春参加中国青年同盟会，一九三七年四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东莞县委工人工作部长，莞太区委书记。一九四〇年任东莞县委委员、组织部长。一九四二年担任宝安县委书记。粤北事件发生后，为了适应当时环境和斗争的需要，上级党确定撤销宝安县委会，改设特派员，由王仕钊同志任特派员，黄佳同志任副特派员。一九四四年王仕钊调东江特委工作后，黄佳任特派员。同年二月，成立东宝路西县委后，黄佳改任东宝路西县委委员。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江纵队坚决执行八路军延安总部发出受降命令，向日本驻军发出通牒，要他们限期解除武装，向我方投降。当时黄佳同志根据东宝路西县委统一部署，亲自组织和领导宝安南头的受降工作。

抗日战争结束后，黄佳同志即于一九四五年冬担任澳门中山特派员，具体领导中山县等地的工作。一九四七年二月调东江，担任东江江北地委副书记（黄庄平同志任书记），并兼任增、龙、从、博支队政治部主任。到一九四八年二月，黄佳同志再次来到珠江三角洲，担任珠江三角洲地区工

作委员会（简称“珠江地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谢鹤筹同志任书记）。同年夏，谢鹤筹调香港分局工作，黄佳代理珠江地工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到一九四九年三月，黄佳同志被正式任命为珠江地工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直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全面解放止。

黄佳同志担任珠江地工委书记期间，一直是分工具体指导顺德县的工作。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始，他就随珠江地工委机关住在容奇，因而大家接触的机会较多。他分管顺德县的工作后，首先是肯定了前期广州市郊委对顺德县工作的指导，特别是对谢鹤筹同志的工作，曾多方面的赞扬。认为谢鹤筹斗争经验丰富，思想观点明确，爱憎分明，值得大家学习。黄佳同志在工作实践中，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具体工作方针。如，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各地群众纷纷要求报名参加部队，掀起了一个参军的热潮。黄佳就立即作出建立珠江三角洲人民起义军的决定，以人民起义军的形式，迅速组织群众，推进了各地的群众运动，壮大了人民武装。黄佳同志除通过会议和定期联系的形式，传达党的指示及布置工作之外，还十分善于利用个别谈心的办法来贯彻党的方针，研究和部署工作。他在个别谈心时，曾多次说到：我们的工作要注意策略，要学会灵活的运用各种斗争策略。不要教条主义，死搬硬套。他在谈到容奇的工作时明确指出：我们说的是容奇，不是大良，也不是龙眼，更不是五桂山。容奇有容奇的具体情况，我们的工作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内物价飞涨，他们发行的什么“金圆券”“银圆券”等货币，早已形同废纸，市场交易早已为港币所代替。但由于缺少港币的流通辅币，造成交易上的种种不

便。于是一些大商行便乘机各自制发辅币流通，实行“刮龙”，使人民利益受到损害。于是，黄佳根据容奇的具体情况，确定由杜启芝同志出头，以容奇镇建设委员会的名义，发行容奇统一流通辅币，取缔各商行制发的辅币，并要他们限期收兑。既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又从经济上进一步控制容桂。同时，他又提醒和教育大家要尊重和正确对待何秋如、李程等老同志。他十分认真地指出：早在大革命时期，顺德人民群众就曾经作出过很大的贡献，龙眼、众涌等地都是当年的重要革命据点之一。何秋如、李程等同志都是当时的骨干，后来又经历了抗日战争的严峻考验，他们在群众中有威信，有很大的影响。你们要充分估计到这些，要发挥他们的作用，要依靠他们进行工作。老区工作就是要依靠老骨干。他们的作用，你们是代替不了的。

黄佳同志一贯勤奋学习。解放后，他患癌症在省人民医院留医，病情已相当严重，但仍以惊人的毅力，艰辛地争分夺秒看书学习，并十分乐观地对其爱人李兰同志说：“几十年来，现在最清闲了。要好好利用这段时间，趁治病的机会加紧学习，充实自己。以便出院后能更好的去工作。”可惜，凶恶的癌症终于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黄佳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忠贞于党的革命事业，勤奋学习，忘我工作，关心群众，关心同志，作风朴素，平易近人。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可贵的品德。我们同黄佳相处的时间很短，而且距今又已三十多年，许多往事已经记忆不清了。现谨以这些点滴的回忆，表示我们对他的怀念。

注：有关黄佳同志传略的资料，是摘自胡均同志收集的，中共深圳市委党史办及曾谷、李兰两同志提供的资料撰写的《黄佳同志史略》。

(三)

黃佳同志在容奇

胡 均

一九四八年秋，中共顺德县工委书记李株园同志对我说：佳叔（珠江地工委书记黃佳同志）要来容奇居住，叫我找房子。于是，我和爱人王志斌由八区返回十区，在容奇租屋住下。不久，黃佳同志就由澳门迁驻容奇。

当时我们在容奇开了一间营蔗行，以商人的身份来掩护党组织的活动。凡到我家里来的人都要先经这间营蔗行中转，经有关同志对上暗号，认为手续清楚，然后才能带到我家，以策安全。当时，各地赌博盛行，商人来往难免要打几圈麻将牌，所以我们也要经常打打麻将，但不是娱乐，更不是赌博，而是既用打麻将牌的声响来掩盖我们的工作上的谈话声，还借此迷惑左邻右里和街上行人，使他们误认为我们也只是商人来往而已。后来，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大天二马仔，在楼上搭了一个凉棚，经常聚集一班人在那里赌牌九，而这个凉棚是可以望见我家门口的，为防意外，黃佳同志转移了，最后搬到乌泥塘杜启芝同志家，继续领导顺德及珠江各县的革命斗争，直至容奇解放。

黄佳同志在容奇的时候，来往的同志很多，有各县的负责同志，也有各地的交通员，有和他同龄的，有比他年纪小或比他年长的，但不论职务高低，年龄老幼，都亲热地称他做“佳叔”。黄佳同志言谈风趣幽默，又善于打诙谐的比方，每每使人在捧腹之余，悟到很多道理。他布置工作不是用硬梆梆的命令式口气，而是用商量研究，共同分析，有时甚至借用一两个生动的故事来启发大家，使人易于理解工作的内容，既愉快接受任务又充满信心。因此，同佳叔接触，总有一种亲切感，一种融洽的气氛，充满真挚的阶级友爱之情。

佳叔身体并非很好，但为了党的事业，他不知疲倦地日夜不停工作，白天忙于接待各地来的同志，晚上则每每写东西到深夜，我有时半夜起来，还见他在微弱的灯光下伏案工作。他间或也扮作一个商人模样，到营蔗行来座谈、看报纸，外间人还以为他是老板之一，也都叫他做佳叔，他也能用商人的口吻，和大家谈笑风生，应酬一番。他来营蔗行不是忙里偷闲，而是等候同约定到这里的人接头，一接上关系，他们就走了。

佳叔本人的生活十分俭朴，但对同志们却十分关心，不仅从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关心帮助大家，而且在物质生活方面也尽最大可能关心照顾各地同志。

佳叔选择容奇这个地方为珠江地工委领导机关所在地，是谋略过人之举。因为容奇不仅经济发达，交通方便，易于同各地联系，而且国民党各派系和地方势力以及各处大头二，都把容奇作为一块肥肉而虎视眈眈，所以，他们之间常因利益冲突而矛盾重重，我们就正好利用这种条件而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开展工作。

佳叔有在东江搞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到珠江后，也着眼于开展武装斗争，而且强调必须通过各种斗争，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用活生生的事例来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够顺利地发展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于是，在顺德由点到面广泛发动群众反“三征”。同时，布置杜启芝同志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容奇镇长，把当地政权秘密控制过来；又派一些同志打入国民党的各党政机关内部，以便多渠道掌握敌情，及时了解国民党动向，为开展各项斗争创造有利条件。不久，各地通过反“三征”等斗争，群众较普遍发动起来了，顺德就迅速组织了武工队、起义军，以至独立团，较好地配合大军解放容奇、大良。

解放后，佳叔患癌症在广州住院治疗，我去探望，他知道我因为在地下工作时执行党在对敌斗争方面的“白皮红心”策略而于解放后被误解，遭到麻烦，就安慰我说：党始终是实事求是的，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出现一些误会是难免的，总会得到澄清。一个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受得起考验，千万不要因受到误会而对党有埋怨情绪，要坚定不移地相信党。这时他自己正在遭受癌症的痛苦磨折之中，而对我仍慰勉有加，殷切期望，在思想上对我帮助很大，使我无限感激！

佳叔虽已去世三十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在我脑际萦回。谨撰此文，用志对革命先辈之不忘，并鞭策自勉，在四化建设中继续为党为人民贡献余热。

(四)

忆 黄 佳 老 师

张 晴

黄佳同志原名黄树佳，东莞县人。抗战前，家住莞城镇北门正街五巷（原一巷），与我家对面，是我少年时期印象最深的老师。1933—1934年我在城南小学就读，他担任高小的数学课和自然课，除了在课堂上教我们文化知识外，还组织了一个课外读书会，辅导我们阅读课外书籍，通过讲故事、专题讨论等多种形式，一方面帮助我们多学一些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向我们传播反对封建和爱国抗日的进步思想。我原来只喜读《七侠五义》、《三国演义》，后来在黄佳老师的启发诱导下，转而开始阅读张天翼、巴金、矛盾以至鲁迅的著作，并订阅报刊和关心国家的命运。升中学后，虽然各自不在同一学校，但由于读书会的切磋，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所以仍经常到黄老师家里借书和倾吐个人对事物的见解，亦听取他对时局变化的分析。1938年日军侵入广东，读书会的不少同学参加了抗日队伍，有的以后成为东纵的战士。后来，同学们在通讯中仍然往往引用黄老师的教导以互相鼓舞，他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启蒙导师。

1942年家乡沦陷，我由于家庭生活驱策，在新基乡做小贩谋生，有一天挑了一担东西在莞太公路上遇见黄佳同志，他问了我近况后说：“我现在宝安南头做生意”。那时我早就

知道他是抗战游击区的领导人之一，因而直接向他诉说了我的苦闷，想跟随他参加工作。但他笑着对我说：“各人环境条件不同，不一定要随我去宝安，你这里不是也有不少同学参加抗日吗？”经过他这次含蓄而又严肃的启发教育，使我逐步认识到政治要求进步还要自己割断封建家庭的束缚，从而使 I 以后终于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广州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并参了党。后来组织分配我来顺德，负责大良镇地下党支部。1949年10月27日，边纵一团解放了大良。次日，由一团组织了大良解放迎军会议，并让国民党的顺德县自卫总队长和原大良镇长参加主持，我们支部同志思想十分不通，正当我同方群英同志争论这问题时，黄佳同志在室内走出来，简要而又精辟地说明了政策和策略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使我恍然大悟。他接着对我说：“原来张晴是你，（注：我原名张煜明，1948年改名张晴）别后七年了，我们不是又重聚一堂了吗？”说后相对而笑。他这种对问题明确不苟而又谆谆善诱的态度，又一次紧紧地刻在我的脑海中。可是，谁能料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呢？！几十年来风风雨雨，每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总会想起黄老师关于“革命是难免有牺牲的，我们要能够经得起考验”的教导，严于律己，坚信党和人民，用积极工作的实际行动来怀念可敬的黄佳老师。



胡庆昌同志生平述略

杜启芝

胡庆昌同志（1910—1952），顺德桂洲外村人。胡姓是一乡望族，许多子弟都能进入高等学校以至出国留学。1934年，胡庆昌偕同堂侄胡励群，到日本东京，与另三位有中共党团组织关系的留学生共同租住在涩谷区上原町的一间房子里。当时，胡励群和胡庆昌也参加了共青团，后来还转为党员。胡庆昌初入东京日本大学攻读政治经济专科，后读政法大学本科。那时，在日本的郭沫若、巴金、陈毓堃等支持并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进步活动。胡庆昌他们与东京很多进步的中国留学生也都参加“文艺座谈会”。由于胡庆昌等几位的住所靠近郊区，比较清静，于是许多进步的中国留日学生组织都在此开会，甚至收藏秘密文件等。胡励群本来身体就不大好，一次在附近小山岗上开会着凉后，由重感冒转为急性肺炎，由于没有及时医治，遂竟至病故。抗日战争开始后，我留日学生纷纷回国，胡庆昌就带同胡励群的骨灰回乡。

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正在形成，容桂在乡知识青年，在第四战区战时工作队的召集下组织起来。这个工作队的队长张奠川表面是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人，实际是秘密的中共党员。他首先组成了“十区防护